

余姚教育

60
年

余姚市教育学会

余姚教育
60
年

余姚市教育学会

序 言

葛云中

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们又迎来了余姚市教育学会成立20周年，全体教育工作者喜气洋洋，同声祝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教育事业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努力下，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推动下，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面貌得到彻底改变。中国15岁以上人口和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超过8.5年和11年，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数达到8200万人，均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1977年那场高考，不仅让一代人的命运发生根本性改变，也使中国高等教育取得飞速发展，从根本上提升了中国核心竞争力，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中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的目标，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

余姚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文献名邦”之美誉，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历史上人才辈出、文化发达，汉代高士严子陵，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中日文化交流先驱朱舜水，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梨洲被称为余姚的“四先贤”。余姚经济雄劲，在全国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县中名列第9位，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余姚教育事业持续发展，使之成为浙江省首批14个教育强市（县）之一，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试验区和浙江省实施素质教育试验县（市）之一，2005年教育强镇（乡）覆盖率实现100%，基本普及了15年的基

基础教育。同时，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作出了巨大贡献。

余姚市教育学会是余姚教育发展的产物，成立于1989年4月，至今已换六届，在各届理事会和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20年来，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在册的各级会员由成立时的149人发展到如今的2500多人，约占全市教师总数的28%。学会还形成了市——乡镇——学校三级组织网络，现有7个专业分会（余姚市教育学会青年语文教师教学研究分会、青年数学教师教学研究分会、书法教学研究分会、幼儿教学研究分会、勤工俭学研究分会、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分会、家庭教育研究分会等），32个团体分会（即各乡镇街道、直属学校分会），已成为余姚市最大的民间组织和教育学术团体。

20年来，学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服务基层学校，服务广大会员，团结依靠广大会员和教育工作者，开展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和学术交流活动；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分析、信息反馈和咨询意见；组织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和教育教学改革实验成果的鉴定和推广；研究、编写教材，出版学术性书刊；举办基础教育新课程培训活动；开展业务咨询、政策咨询、法律咨询和科普宣传等活动，对推动我市中小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高校长的管理水平和教师的教学能力，作出了积极贡献，深受广大会员的欢迎。

20年来，学会形成了良好的传统和会风，密切配合教育行政部门的中心工作，关注教育热点难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为教育行政决策建言献策；注意发扬学术民主，发挥了群众性学术团体的巨大作用，在业务范围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举办大型学术活动50多场次，会员承担各级各类教育科研课题1500多项，公开发表教育教学论文3800余篇，出版著作28部。

20年来，学会组织指导各专业分会独立开展有特色活动，青语会和青数会把培养青年教师作为工作重点，通过学会，组织开展师徒结对、听课评课等活动，使学会成为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的摇篮；书法分会举办老年、少年等书法培训班，使老有所乐，少有所成，不少作品在全国和省市书法作品比赛中获奖；幼教分会、家庭教育分会不断探索新时期新形势下幼教工作、家庭教育的新特点新思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研究分会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班主任队伍建设；各乡镇（街道）分会，发挥学会会员在教育教学中的骨干作用，在教育教学创新、科研、各类竞赛活动中，取得良好成绩。

20年来，学会建立和健全了会议制度、考核评优制度、会员优秀论文（课题研究成果）评选制度、档案制度、财务制度等。学会已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发展我市教育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是推动我市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支积极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参谋和助手。办会经验分别于1995年吉林长春、2001年四川绵阳、2006年9月河南漯河召开的“中国教育学会基层学会工作经验交流会”作典型介绍。学会已连续十二次被评为《中国教育学刊》工作全国先进单位，六次被评为宁波市教育学会先进集体，三次评为浙江省教育学会先进集体，二次评为余姚市先进集体和五星级学会。

60年一甲子，中华民族又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满怀信心，同心同德，携手共进。在祖国六十周年到来之际，我们衷心祝愿伟大的中华民族更加团结和谐，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伟大的人民更加富裕安康。

人生20正是风华正茂、生气勃发之时，在教育学会成立20周年之际，我们共同祝愿她取得更大成就，开创更加辉煌的局面。

最后，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衷心感谢全体教育工作者为余姚教育事业作出的不懈努力，也要感谢学会秘书处的同志编辑了《余姚教育60年》一书，让我们回忆起创业的艰难，品尝到桃李的芬芳，领略了成功的喜悦，更让我们去展望未来的辉煌。

2009年9月8日

目 录

走过60年

韶光自惜度八秩·····	章亦平 (1)
我记忆中的解放那一年,那一天·····	宋云俊 (8)
改革开放带来的余姚教育巨变·····	杨增庭 (13)
我市教育发展的重彩浓笔	
——勤工俭学与校办产业·····	王卫平 俞健全 (16)
我的六十年求学与从教经历·····	宋云俊 (21)
风风雨雨六十年·····	杨振华 (26)
在艰难曲折中造就辉煌	
——建国六十周年来家乡教育发展的回望·····	陈金柱 (31)
与青少年朋友谈家乡60年教育·····	裘传忠 (36)
与共和国同龄,看教育之发展·····	张东良 (40)
从学校(舍)变化看六十年伟大成就·····	陈俊强 (43)
站起来,立起来,强起来	
——亲眼目睹说教育·····	俞岳良 (45)
建国六十年,沧桑话巨变·····	吕振江 (50)
变化中的感想·····	翁有兴 (52)
春风吹绿了丈亭教育·····	徐 震 (55)
四明山教育的变迁·····	唐训顺 (60)
新旧教育制度下退休教师的生活境遇·····	谢欣胜 (63)

小学教育

- 风雨七十载，奋斗一路歌·····沈黎波（68）
- 亲历时代变革 感受教育发展 ·····李亚范（72）
- 我和实验小学·····施煜盛（77）
- 追求理想
- 余姚市实验学校十年办学记略
- 余姚市实验学校（80）
- 把节能种子播进孩子心田
- 东风小学教育集团节能环保教育18年的故事
- 严培源（87）
- 我在农村的教育历程·····杨永苗（92）
- 四十年教育的不凡路·····胡正其（95）
- 30年旧貌换新颜·····卢三妹（98）
- 改变：熟悉而又陌生·····胡燕华（101）
- 从小跑步到大发展
- 牟山镇中心小学简史·····魏政台（103）
- 操场的变化·····陈调琴（105）
- 闪闪的红星
- 上王岗八一希望学校散记·····黄军民（109）
- 十年如歌·····许 琼（113）
- 踏着改革的浪花，赶着教育的浪潮·····张 琪（116）

初中教育

- 姚东教育的新风景·····谢晓滨（119）
- 不是退出历史，而是在整合中腾飞·····毛 颖（123）
- 变化中的牟山中学·····黄伯棠（126）

低塘初中的三十年变迁·····	王定坤 (129)
亲历余姚教育的改革发展·····	王继烈 (131)
校事琐忆情悠悠·····	胡 峰 (135)
一名代课教师的感想·····	倪亚毅 (138)

高中教育

见证变迁, 推动发展

——余姚中学校长陈云海专访·····	程载国 (141)
我在姚中四十年·····	袁恩杰 (152)
音乐教育伴我一生·····	张 逸 (158)
姚中学生课余美术创作硕果累累·····	韩天麟 (160)
余姚中学的陈年旧事·····	徐奎杨 (162)
喜看四中四十年·····	黄黎明 (170)
让生活更精彩	

——余姚四中工会活动剪影·····	余姚市第四中学 (172)
练石与沃土·····	陈海翔 (174)
五十三载风雨, 半个世纪收获·····	余姚市第五中学 (176)
笑傲风云共潮生	

——记余姚市第八中学五十三年历程·····	张云杰 (182)
余姚市职业技术学校发展历程及办学特色	
·····	余姚市职业技术学校 (190)

其他教育

艰苦创业, 与时俱进

——临山镇中心幼儿园简史·····	临山镇中心幼儿园 (202)
-------------------	----------------

姚城最具魅力的童话王国

- 记余姚市机关幼儿园…………余姚市机关幼儿园 (206)
- 余姚特教二十年…………章国君 (208)
- 从扫盲识字到终身教育
- 农村成人教育发展历史…………叶银祥 (212)
- 风雨电大路…………华建新 (214)

研究与培训

- 忆两次全国性的学会活动…………周新华 (229)
- 余姚市义务教育段区域专职辅导机构沿革
- …………毛银龙 (233)
- 服务教学 服务教师 服务学校 努力提高我市教育教学质量
- 余姚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科所)
- 三十年(1978-2008)工作回顾…………郑水军 (238)
- 风雨兼程一万天 硕果累累三十年
- 余姚市教师进修学校建校30周年记…………朱祖益 (281)

成长足迹

- 铃声荡起的记忆…………郑汉良 (286)
- 一个“老三届”的初中生活…………陈晓红 (291)
- 两张高考准考证的故事…………徐百昂 (297)
- 一个老教师的心里话…………万康年 (301)
- 教育发展伴我成长…………李 丹 (305)
- 四十年亲历:从臭老九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韩永昌 (307)
- 比学生时代,看教育发展…………黄志昌 (313)

求学三代人·····	李惠莲 (317)
青山着意化为桥	
——记走出山村的学子·····	史习范 (319)
不平凡的30年教育·····	周乐君 (322)

韶光自惜度八秩

余姚市离休干部 章亦平

我的祖籍在浙江兰溪县，祖父是乡下郎中，行医到宣平县，遂定居在宣平县城（今属武义县）。1947年来余姚阳明二小任教，1949年上半年在余姚上林湖参加革命工作，从此一直生活在余姚，工作于斯，成家于此，离休于斯，安度晚年于斯，至今已经六十二年了。我做过教师、校长，做过教育局副局长，做过主管文教的副县长、政协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工作在教育战线。大概出于这一原因，余姚市教育学会、《余姚教育研究》举办“余姚教育60年”征文活动，小施找到我，希望我谈谈余姚教育。他给我的题目是从宏观上谈谈余姚教育的发展变化，我觉得这于我却是勉为其难，因为本人虽然较长时间从事文教工作，但研究还是非常欠缺，实在说不全，论不深；再者《余姚教育志》和即将出版的《姚江教育》对此都有系统阐述，似乎也无须赘述。我想还是结合社会背景，选取自己从事文教工作的几个片断，谈谈个人的体会和反思，这于己可谓力所能及，于读者可能更见真切。

从旧师范到新教育

我于1944年初中毕业考入浙江省立湘湖师范学校。学校成立于1928年，是我省较早的一所师范学校，师资力量较强，教育质量较高，校长金观海原为东陵大学教授，是著名的乡村教育家，思想进步，作风民主，关爱师生。我就学的时候正值抗战后期和内战初期，学校数度搬迁。我先在松阳县古市分校就读，至抗战胜利后，学校于1946年1月搬回萧山，借地城厢镇祗

同寺学习。但尽管如此，学校课程开设还是比较齐全，教师授课也兢兢业业。我学的是普师（当时湘师还有音师），课程包括公民、国文、数学、体育、卫生、教材教法、教育心理、军事训练、实习、参观等，强调“教、学、做”的统一。当时形势教育、抗战宣传也有所开展，特别是1947年上半年，我们毕业班最后一学期只有实习和参观两项任务，学校地下党员数次组织我们开展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在上海参观期间，我们还聆听叶圣陶先生有关教育的讲话，随班里地下共产党员造访当时在上海的郭沫若、平心、翦伯赞、马叙伦等文化名人，了解蒋介石挑起的内战和革命形势。

1947年7月我从师范毕业。当时内战正酣，对于我们来说，毕业即是失业。后来校长金海观推荐我和另两位同班同学给其弟子、时任余姚县政府教育科科长的蔡珽，我终于被分配到余姚阳明二小（今实验小学前身）任教。不到二年，余姚解放，成立军管会。不久，成立县人民政府，设立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并在各区设文教干事、助理。人民政府接管原国民政府所属学校，取消训导制，调整课程设置，余姚教育呈现一派新气象。1949年9月，我被派担任道林区文教干事、助理，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国民党败退不久，舟山尚未解放，姚北土匪频繁骚动，政治形势还相当紧张。有一次我带了自己的短枪，又向区中队借了一支长枪去胜山了解学校状况，回来后区里同志责怪不已。原来胜山是土匪最为猖獗的地方，区武装部长的妻子就曾遭到过土匪冷枪的伤害。我当时的的工作不仅仅是恢复学校教育，还包括组织教师向群众宣传教育、安定人心、安定社会、征收粮食等。而这是我在旧式师范教育中所没有的，是需要我在新社会、新岗位中努力学习和实践的。这方面印象最深的活动是组织区小教寒假服务团上街表演。那是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服务团二十余人在道林街上，汽油灯下，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车子灯形式载歌载舞，宣传共产党

好，宣传人民翻身做主人，鼓动群众纳粮支援舟山前线。

1950年5月，我去省浙干四期学习，之后调到县委秘书处工作。1954年，中央要求各地调派党员知识分子到中学，以加强领导，县委决定调我到余姚中学工作。为了适应学校工作，当年11月，我参加了省教育厅举办的中学校长训练班，为期半年。训练班的课程内容除了教育学、心理学外，突出了党的领导和苏联教育管理模式，这对我来说又是接受了一次全新的教育。学习完成后，1955年5月，我调入余姚中学，任副校长。当时余姚中学受宁波专署文教科直管，校长由县长郭子栋兼任，我主管行政，另一位副校长王世琯主管教育。我上班时正值解放后首届高中毕业，“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祖国的栋梁”，师生们高亢的歌声中充满着多么美好的期许和希望！学校倡导集体备课，每周举行一次教研活动；领导深入课堂，参加听课、评议；课余办公蔚然成风，除了星期天，教师在校工作到晚上。学校的教风学风都是刻苦勤奋，积极向上。1956年上半年，报纸发表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我为总理明确把知识分子列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振奋不已，组织教师在课外活动时间学了几天，教师积极性大大提高。后来我在全县教育系统的党员会议上作了发言，介绍学习情况和教师精神面貌变化。宁波地委文教部的一位丁处长也参加这次党员会议，他听了我的发言认为很好，要我总结上报。这样，我写了总结，交支部书记看过，后以余姚中学支部的名义上报地委文教部。

从反“右派”到准“右派”

伴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肃反”、“反右”运动接踵而来。

1956年暑假，全县中学教师集中到宁波参加“肃反”学习，我任余姚班部副主任。1957年，集中全县小学教师在余姚中学进行“肃反”学习，我仍任班部副主任。也是在这一年，

全国开展“反右”运动。余姚教育系统被宁波定为试点，宁波所属各县文教部长、文教局长被通知到余姚参加试点。所以全县小学教师“肃反”结束，紧接着全县中小学教师又集中在余姚中学进行“反右”学习。

这次“反右”，我们全县教育系统有一百多人被划为“右派”，其中余姚中学有十人被划为“右派”。

全县中小学教师“反右”运动结束后，1957年9月，接到省教育厅通知，要求各地、县文教局长，中学校长到杭州“帮助省教育厅整风”。省教育厅整风结束回到余姚后，通知我参加县委机关的“反右”学习。1957年，我从参与领导全县小学教师“肃反”学习，到全县中小学教师“反右”，大半年时间没有休息过一天。县委机关“反右”结束后，我回到学校，想不到我也由“反右”的组织参与者变为一名准“右派”分子。12月的一天，县委组织部长找我谈话，声色俱厉，列举我的反党“罪状”，宣判我为“右派”分子。我的“罪状”主要有四条。一是包庇张海帆违抗党的“向工农开门”政策，招收地富子弟入学。1956年夏天余姚中学招收高中部新生，我在宁波参加中学教师“肃反”，学校招生工作由教导主任张海帆、副校长王世琯、总务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何廷耀负责，有两名考生分数相差一分，结果招了低一分的地富子弟，而落选了高一分的贫农子弟。余姚教育系统“反右”快结束时，主管教育的副县长责问我，张海帆反对“向工农开门”，为什么不划右派？我叫校办秘书查了去年招生材料，果然如此，我批评了何廷耀为何不把好关。后来张海帆被划入“右派”。参加县委机关“反右”时，受我批评未把好关的何廷耀给我贴大字报，声称我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写的报送宁波地委文教部的发言材料中有“以前我们对知识分子使用多于培养，批评多于教育”的言语），这又成为我的第二条“罪状”。第三条“罪状”是发表谬论。在帮助省教育厅“整风”

的一次讨论会上，针对学校发展党员应是重教师还是重勤工的问题，我认为学校工作重心是教育，队伍主体是教师，同样条件应重教师后勤工。而当时知识分子的定性已由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又回到了资产阶级，我的言论便被当作丧失党性的证据。第四条“罪状”是工作消极。帮助省教育厅整风时，原指派我任组长，当时接连几次学习和运动之后，我太累了，有些政策我也自以为把握不了，所以推辞了任组长。

我想申辩——有的是我不知情，有的是我实话实说，有的是我出于对党的忠诚，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个人的申辩有什么用？在党委面前，作为斗争的对象有什么申辩的权利？——我冤屈、痛苦、困惑、无助，几乎夜不成眠，神经也出现了衰弱的症状。然而出乎意外的是，我当时算是“地管”干部，我的“右派”材料上报宁波地委时，正逢中央对“右派”划定紧急刹车，竟没有批下来。但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我受到了撤职、留党察看、工资降二级的处分，成了一名仅以侥幸未划上“右派”的准“右派”。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从遮颜过到重抬头

受处分后，我被下放到正在修建的大池墩水库、姚江大闸工程指挥部，虽说是担任了一定的领导工作，实际上是改造。近四年后，1961年11月，被调到县文教局任副局长，主管中学线工作。当时正值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我们中学线的重要工作是学校网点调整，原七所完全中学有四所改为初级中学，原十一所公立初级中学有五所撤销，通过相对集中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964年，我先后参加上虞、四明山镇的“四清”工作。

“文革”开始后，我回文教局被扣上“走资派”帽子，接受批判。1972年1月，我调到低塘中学任党支部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工作。当时是“文革”中期，已是从“反四旧”、

“革命大串连”转入“复课闹革命”阶段，我要求配齐教师，开齐课程，着手恢复教育教学秩序。然而“文革”余烬尚烈，另一位学校领导反对文化课学习，反对开设体育课，说是学习“红宝书”就是学习文化，上学放学走路就是运动，就是体育。又有造反派教师向区革委会汇报我的“反动”动向，区革委会又反映到县革委会，于是县革委会发话了：“低塘中学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章亦平想搞复辟！”当年鲁迅自嘲“运交华盖”“破帽遮颜”，我也处于同一困境。毛泽东曾宣布“右派”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夹紧尾巴”，一条是“自取灭亡”。我能怎么样？我只好“夹紧尾巴”。近年来，有几次我在低塘中学工作时毕业的同班或同届同学聚会，要我讲话，我深感愧疚，无话可说，只能说对不起，我没有做好教育工作，没有让你们学到科学文化知识，以致于虚度了美好青春。

随着“四人帮”的粉碎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和国家开始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我于1979年5月得到平反，并再度调到余姚中学，担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当时学校教师不足，干部不齐，设备残缺，教室破漏，礼堂坍塌，真是百废待兴。但是大家的精神面貌却是像迎来第二次解放一样振奋，“右派”摘帽，冤假错案平反，高考恢复，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施行，一系列的大政方针让教育走上了正轨，让知识分子扬眉吐气。这次我在余姚中学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心情舒畅，教师支持，工作顺利，工作的效率，工作的积极性，就我个人而言是满意的。除了日常事务，我的主要工作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强队伍建设。向县教育局打报告，为在“文革”后期被隔离审查一年的教师何人寰、徐仲力平反，让他们回校教书。提名袁子良负责教学管理工作。二是改善教育、生活条件。维修教育设施，新建两幢教育楼。联系县自来水厂，安装自来水，解决师生吃水问题（此前学校用水来自校后河水，而校后河水经由化肥厂，污染严重，不少教师用盐水瓶装自来水